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ECONOMICS AWARD

获得者丛书

CHINA



吴敬琏专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吴敬琏专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敬琏专集/吴敬琏著.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5.10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丛书)

ISBN 7-80636-807-8

I. 吴... II. 吴...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5369 号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丛书

吴敬琏专集

-
- | | |
|---|---|
| 著 者: 吴敬琏 | 网 址: www.sxskcb.com |
| 责任编辑: 郝建军 李慧平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 复 审: 王宏伟 |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新华印刷分公司 |
| 终 审: 赵建廷 | |
| 责任校对: 马秀萍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
| 责任印制: 李 健 | 印 张: 21.25 |
| 出 版 者: 山西经济出版社 | 字 数: 351 千字 |
|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 彩 插: 12 |
| 邮 编: 030012 | 印 数: 1-3000 册 |
|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
| 0351-4922085 (综合办) |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E-mail: Fxxz@sxskcb.com (发行中心) | 定 价: 49.00 元 |
| Web@sxskcb.com (信息室) | |
| Jingjshh@sxskcb.com (综合办)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四位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获此殊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颁奖并做了重要讲话。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侧重于评选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此奖被誉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进一步了解四位获奖者的杰出贡献,借鉴学习他们研究问题的理念和方法,促进中国经济理论的繁荣和政策制定水平的提高,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做一点贡献,我们精心策划了这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丛书》。本《丛书》共四册:《薛暮桥专集》、《马洪专集》、《刘国光专集》、《吴敬琏专集》。每册专集均由获奖者按照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授奖理由,选取本人最有代表性的文章组成,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对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学家早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起到积极的作用。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5年4月

授奖理由

Rewarding Reason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一、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和刘国光、董辅礪、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的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意见书的写作。他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做出了贡献。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的研究报告和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做出了贡献。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

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以吴敬琏为首提出的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三、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

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我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93~2004年他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他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做出的总结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倡导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1988年，他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六、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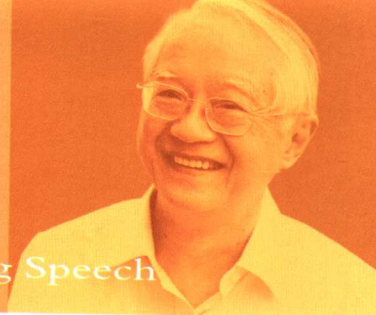
1984年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吴敬琏为主的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除理论活动外，吴敬琏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教育以及经济学信息和知识传播方面的卓著成绩也为各方面人士所称道。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他曾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的学术著作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2001年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2003年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答 辞

Answering Speech



感谢中国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给予我杰出贡献奖的殊荣。

我把这一奖励看做对我国经济学家群体对改革做出的贡献的肯定和表彰。

中国经济学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是，即使在“左”毒横流、经济科学处境最差的年月，有科学良知和公民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努力。在今天，我特别要向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表达敬意。一位是经济研究所的老所长孙冶方。是他，在极其恶劣的大环境中，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竭尽全力在经济所营造了一个能够研究和讨论经济学的小环境，使我们得以开始对中国改革道路的最初探索。另一位是指出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第一人——顾准。我个人要特别感谢他。因为他不但在学术上给予了我重要的指点，而且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经济学的研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改革的阻力还很大，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也并不分明。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靠的是经济学界的集体奋斗。例如，这次获奖人之一的薛暮桥在1980年就在提交中国的文件中第一次写进了改革应以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纲领性意见。1984年在第二次关于改革方向的辩论中对于拨正改革方向起了重要作用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一文是由这次评奖的获奖人马洪组织的。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年过八旬的薛老带领刘国光和我与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

学家对垒,也充分显示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们的集体力量。

参与改革理论研究并做出贡献的不只是经济学界的名家大儒,还有许许多多经济学人。经济学界为中国改革做出的,是集体的贡献。

这里我想举一个人的例子来讲一讲自己的体会。前几天温总理在看望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委员时,曾经引用了西奥多·舒尔茨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中的一段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因而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依靠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十分惭愧的是,由于我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苏联的一套,受到苏联式的只重工业、轻视农业,认为只有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的偏见的影晌,我自己对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以及农业经济学,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种认识缺陷,不能不影响到自己对中 国改革问题的把握,以致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参加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以后的很长时期,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眼界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国有大企业改革的狭隘范围之内。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许更早一些时候,我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对于农村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具有真知灼见,并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后来我提出“有机战略”是中国改革成功之道的命题,乃是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发扬。当然这也是从温州和台州的农民企业家做出的业绩得到实际教育的结果。

在结束我的简短讲话的时候,我想再次向诸位表达感激之情。中国走向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还很长,中国经济学的成长和完善更无有穷期。愿经济学界同仁在今后的岁月中相互帮助,砥砺切磋,使我们的学科取得更大的进步!



吳敬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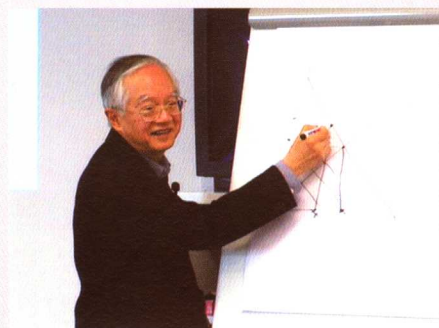
在颁奖仪式上致答辞



做客央视《读书时间》



在台北发表讲演



在CEIBS给CEO班上课



在浙江考察缝纫机厂



在“中国担保论坛”讲演



做客“全景网络”



吴敬琏工作照



各国经济发展是否处于“工业化”阶段？

吴敬琏

经济史

为北的 90 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合理性，

人们提出了所谓“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争论。从西柏林“近年来工业化进程的争论”，

或是美国通过“后工业化”的无望努力。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能否经过，而在于各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否存在这样一段“后工业化”。

过程中
资本品
工业优
先

指

齐

“后工业化”说的主要根据，是德国经济学者瓦格纳提出的“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划分。瓦格纳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本品工业（如钢铁、机械、化工等）的优先发展是工业化的标志。而“后工业化”则是指资本品工业的比重下降，消费品工业的比重上升。瓦格纳认为，德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经历了“工业化”阶段，而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则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瓦格纳的这一观点，对后来的工业化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瓦格纳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本品工业的比重会先上升，达到一个高峰后，才会下降。而消费品工业的比重则会随着资本品工业比重的上升而下降。瓦格纳认为，德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经历了“工业化”阶段，而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则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瓦格纳的这一观点，对后来的工业化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小 传

Brief Biography



吴敬琏, 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早在1956~1957年期间, 吴敬琏就参加了全国体制调查和财税等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而其后的20年, 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 他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 虔诚地为求赎自己知识分子的“原罪”, 主动地改造思想, 向“左”的思想靠拢, 走了不少弯路。

吴敬琏1976年以后的学术生涯, 是从清理自己的思想开始的。他在1978年2月北京经济学界批判“四人帮”上海写作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会上, 做了《关于社会主义“两重性”问题的再探讨》的发言, 批判自己60年代初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提出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和痕迹”的过渡时期的理论。^①接着, 他根据自己1969年以后在与挚友顾准的切磋中形成的思想, 对“左”的理论 with 政策进行系统清理和批判, 同时, 开始了对我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他在70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期的著作所达到的高度, 超出了当时经济学界的一般水平。^②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放权让利”使企业领导人和职工的积极性在短时期内有所提高,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刺激效益衰减、职工报酬超支等消极后果, 并导致了财政赤字猛增、通货膨胀加剧等宏观病症。受东欧经济学家W. 布鲁斯和捷克O. 锡克的启发, 吴敬琏认识到, 改革不是一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的政策, 而是从一种经济系统

^① 吴敬琏:《关于社会主义“两重性”问题的再讨论》(1978年2月7日), 见《吴敬琏选集》, 3~40页,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② 参见吴敬琏、周叔莲:《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历史考察》, 载《历史研究》, 1977(4); 周叔莲、吴敬琏:《论“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 载《历史研究》, 1978(7); 吴敬琏、林青松、薛永应:《批判“四人帮”的社会法西斯经济学》, 载《红旗》, 1978(5); 吴敬琏、周叔莲、汪海波:《利润范畴和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 载《经济研究》, 1978(9)。

(体系)到另一种经济系统(体系)的跃迁;要对这种系统跃迁作深入的研究,必须具有深厚、扎实的理论素养,具有严密的分析框架。

怀着寻求新知识的渴望,1983年1月~1984年7月,吴敬琏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从事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的客座研究。在此期间他从头开始补修了现代经济学。幸运的是,当时经济学正处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新突破之中,因此,吴敬琏得以把自己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研究放到了更加坚实的理论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在往后20年的研究工作中,吴敬琏做出的主要理论贡献包括:

(一)结合理论与实践论证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然性

除“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一关系改革的手段和目标的问题外,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经历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1978),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79),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等提法。其间,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不过,吴敬琏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不是就事论事的现象讨论,也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辩驳,而是以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所作的比较为依据的,^①因此有理论上的严谨性和较大的说服力。“吴市场”——这一在1990年的激烈辩论中被坚持计划经济的人们送给的贬抑绰号,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却成为美誉。

(二)主张整体协调改革

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接下来便是改革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在1985年,

^① 参见吴敬琏:《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和市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6);又见《吴敬琏自选集》,1~39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吴敬琏就针对当时流行“搞活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提法，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①在新体制下，企业从旧体制中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指通过竞争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市场，并且不单有竞争性的商品市场，还要有要素市场，从而形成一个体系；旧体制时代的宏观调节体系是由中央行政当局“一竿子插到底”，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决定经济资源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的配置。而新体制下，市场机制才是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间接地进行。^②

上述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主张，被理论界称为“整体改革论”或“协调改革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理论讨论和方案设计中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

(三)探索并推进国有经济根本改造道路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

吴敬琏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介入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吴敬琏是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考虑问题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他也曾想按照自己的老师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模式，设计一种在保持资源的计划配置的大格局下给国有企业以自主权，以便发挥它们的积极性的体制。

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愈来愈深入地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明确起来：放权让利并不是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实现企业的制度创

^① 他在1985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稿）》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一意见。吴敬琏：《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见《经济改革问题探索》，268～269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② 吴敬琏：《以改善宏观控制为目标，进行三个基本环节的配套改革》（1986年1月24日），见《吴敬琏自选集》，109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88；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等：《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